

“双一流”建设提升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国际化水平

——区域国别视角

徐航天 苏志 侯俊军 林为洋*

摘要: 基于爱思唯尔论文全文数据库,本文从区域国别视角探究“双一流”建设对中国经济学研究国际化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入选和未入选“双一流”建设的高校均受到了政策的积极影响,后者可能源自竞争驱动效应;中国学者发表经济学国际期刊论文的数量和影响力显著提升,但论文的研究议题日趋集中于本土经济问题,国际问题中的中国声音相对不足。这一现象在非顶尖院校、非高层次期刊中尤为突出;同时,相比七国集团成员国和中国邻国,针对其余国家的国别研究显著不足。

关键词: “双一流”建设; 经济学研究; 区域国别研究

DOI: 10.13821/j.cnki.ceq.2025.06.07

一、引言

2015年10月,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双一流”建设),明确提出以学科为基础,提升中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经济学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之一,更应承担起这一时代重任。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国际化发展,一方面在于立足国情,讲好中国故事、总结中国经验,做好本土问题的国际发声和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① 另一方面,还在于提升中国高校和学者对世界经济的理解,针对全球性、区域性重大问题,提出有影响力的中国观点。然而,本文研究发现,当前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国际化发展偏向关注前一方面,对后一方面的探讨相对不足,这与中国的世界大国地位和承担的国际责任不相匹配。加强域外经济问题(或区域国别经济问题)研究,不仅能从中国视角对全球经济问题提出独特见解,推动理论创新与发展,还可为国家政策制定和企业国际化经营等提供学术支持。^② 基于此,本文将区域

* 徐航天、苏志、林为洋,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侯俊军,湖南工商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通信作者及地址:苏志,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石佳冲109号湖南大学财院校区经济与贸易学院,410006;电话:18656304029;E-mail:zhisu@hnu.edu.cn。本研究得到湖南省普通本科高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20240100040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2173038)、科技部高端外国专家项目(G2023160009L)、2025年湖南省学位与研究生教学改革重点研究项目的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人和期刊主编的宝贵建议,当然,文责自负。

① 林毅夫(1995)最早提出了经济学的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问题,并预测中国经济学人只要以规范的方法来研究本土问题,21世纪中国将会成为世界的经济学研究中心。

② 在我国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中,其下设的世界经济学二级学科即承担了本文所定义的区域国别经济研究工作,相关专门研究机构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等。2022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将区域国别学提升到一级学科的位置。经济学因其理论框架的广泛适用性和研究方法论的政策指导性,成为区域国别研究中的核心学科基础。

国别视角纳入分析框架,评估“双一流”建设对中国经济学研究国际化发展的影响。

本文基于全球最大科学出版商之一爱思唯尔(Elsevier)的论文全文数据库,通过应用程序接口(ScienceDirect APIs)和文本识别方法,提取了其出版的经济学领域 SSCI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期刊上发表论文的研究对象国信息。结合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Web of Science, WOS)的元数据,汇总了 2010—2023 年经济学领域国家-年份层面,以及中国国内高校-年份层面的国际论文发表相关指标,包括发表数量、学术影响力、期刊层次、国际合作和研究对象国等。采用特征事实分析和双重差分模型^①,研究发现:第一,“双一流”建设以来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国际发表能力及影响力相较其他国家显著提升;从区域国别视角看,经济学研究(除纯理论、方法或实验类研究)议题日趋集中于中国本土问题,域外研究占比显著下降。第二,“双一流”建设通过“资源配置效应”和“竞争驱动效应”,对“双一流”入选高校和未入选高校的论文发表均产生了积极影响。然而,对于“竞争驱动效应”占主导的非顶尖院校,在发表数量和研究影响力上升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伴随着高层次期刊发表占比下降,以及议题向本土问题倾斜的特征。第三,研究议题本土化现象在非顶尖院校主导的非高层次期刊更为明显;域外研究在七国集团(G7)成员国^②,以及与中国地缘政治和经济联系紧密的邻国上相对稳定,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关注则显著下降。

本文与两支文献相关:第一支文献评估了各类高等教育提升政策的影响。在高等教育布局上,以“211 工程”“985 工程”为代表的重点建设项目显著提升了入选高校的科研竞争力和国际学术影响力(鲍威等,2017;Wang et al., 2024),但也存在高校同质化加剧(Zong and Zhang, 2019)、发展不均衡(Wang et al., 2024)等问题;“双一流”建设统筹以上项目后,入选高校在本科生源质量、科研创新效率、科研经费和学科建设水平等方面均有显著提升(吴宇川和丁延庆,2022;原珂和廖逸儿,2022;马浚锋,2025),同时对非入选高校也存在溢出效应(马浚锋和罗志敏,2024)。除此之外,海外人才引进和本土师资提升等队伍建设政策(余广源和范子英,2017;李澄锋等,2020;刘庆丰等,2025),科研资助改革等资源支持政策(林雨昕和刘怡,2023;郑世林和张沛康,2024),以及高等学校扩招、新建校区等教育扩张政策(钟卫和姜万军,2017;张文杰和哈巍,2022),均在促进科研产出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对于高校合并的影响,许宏伟和钟粤俊(2022)认为其促进了科研产出,而 Kang and Liu(2021)则持相反观点。第二支文献聚焦于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评价。教学与课程、科研成果、学术合作、大学排名等是已有文献的主要关注点(贺德方,2011;林金辉,2012;郭丛斌,2016;何佳讯等,2021)。在科研产出评价上,多聚焦于数量、质量及学术影响力等指标(Hu, 2020; Kang and Liu, 2021)。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背景下,国际化评价指标体系有待进一步优化和完善。何佳讯等(2021)与刘庆丰等(2025)分别基于管理学国际期刊发表数据及中国高校经济学教师的中英文发文记录,分析中国学者的国际合作、前沿热点、参与国际知识生产的学术贡献路径及海外访学效应等,也涉及经管类论文发表的议题国别特征。其中,刘庆丰等(2025)发现海外

① 双重差分的第一次差分是处理组(中国)与控制组(其他国家)各自在 2015 年前后的平均变化(时间维度差分),第二次差分是将处理组的平均变化减去控制组的平均变化(组别维度差分)。

② 七国集团(G7)是由七大工业国组成的国际经济合作论坛,成员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和加拿大。

访学经历会促进中国学者发表中国议题的国际论文,但未促进中国学者开展国际议题研究。

本文贡献如下:首先,从全国层面评估了“双一流”建设的总体效应,区别于现有文献主要基于高校层面数据估计入选“双一流”建设为高校和学科带来的直接效应(吴宇川和丁延庆,2022;原珂和廖逸儿,2022;马浚锋,2025)。与以往重点建设项目不同,“双一流”建设构建了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高等教育质量提升激励体系,其对未入选高校同样会存在多个维度的正向溢出效应(马浚锋和罗志敏,2024)。因此,现有文献以未入选高校作为控制组进行的实证评估,可能存在低估政策效应的问题。其次,将经济学研究发展趋势结合到区域国别研究领域,勾勒了当前中国经济学“国际化”和“本土化”并存的学科发展特征。以往对中国论文发表国际化的探讨多聚焦于发表于国际期刊论文的数量、质量及学术影响力等指标,忽视了研究议题这一维度的变化。部分研究,如何佳讯等(2021)和刘庆丰等(2025)关注了研究的议题国别,其识别基于人工判断或仅限于标题层面,且未进行深入探析。随着高校国际化的评价标准越来越注重影响力与知名度等软性指标(陈丽媛和刘念才,2019),立足大国担当,本文的发现为学科发展国际化水平的评价提供了新的维度。最后,通过 Elsevier 数据库抓取大量经济学论文的全文文本数据,本文系统识别了 2010 年以来中国高校发表经济学国际论文的研究对象国别特征。区别于现有研究主要基于论文标题、摘要、关键词、引用情况等识别研究关键信息(Angrist et al., 2017),本文的全文文本分析在识别上相对更加精准,为这一类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二、制度背景与研究假说

(一) 制度背景

自 2015 年启动“双一流”建设后,教育部等相关部门明确了建设的基本原则、目标任务、支持方式和管理机制。相比“211 工程”和“985 工程”,“双一流”建设注重以学科为基础的分类指导,改变了以往侧重高校综合实力评价的传统,引导高校集中优势力量聚焦特色领域发展,为那些在特定学科具有卓越表现和国际影响的高校提供了发展机遇。不仅如此,“双一流”建设引入了基于建设成效的动态调整机制,入选名单有进有出,破解了长期以来重点建设项目中身份固化、竞争缺失等问题。^①此外,中央强调省级政府应“统筹推进区域内有特色高水平大学和优势学科建设,积极探索不同类型高校的一流建设之路”。^②各省级政府结合区域高等教育发展实际,在 2015 年后陆续出台了省级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方案,即省级“双一流”建设。

在上述制度框架下,国家和省级“双一流”建设通过政策和资源倾斜重点支持入选高校,为其高水平、国际化发展提供强大助力,形成资源配置效应^③;而未入选高校为获得

① 2022 年第二轮“双一流”建设调整对经济学的影响较小,后续实证分析剔除 2022 年及以后数据,基准结果仍保持稳健。

② 参见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2/moe_843/201701/t20170125_295701.html, 访问时间:2025 年 3 月 13 日。

③ 附录 I 基于手工收集的城市或高校层面教育和科技经费支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等数据提供了补充证据。限于篇幅,附录未在正文列示,感兴趣的读者可在《经济学》(季刊)官网(<https://ceq.ccer.pku.edu.cn>)下载。

“双一流”建设所带来的潜在资源倾斜,同样具有强化优势学科建设的发展动机,以期在下一轮国家或省级“双一流”建设中入选,即产生竞争驱动效应(万明和梁壮,2021;马浚锋和罗志敏,2024)。因此,“双一流”建设通过上述两个效应,推动了全国范围内高校间的良性竞争,激发了各层次高校的发展活力,构建了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高等教育质量提升激励体系。^①

(二) 研究假说

“双一流”建设每五年一个建设周期。在学科层面,要求在具有可比性的领域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国际化是参与全球竞争的必要条件(陈丽媛和刘念才,2019),英文学术期刊的发表数量,以及发表期刊的影响因子等指标是国际学术和学科评价的关键维度之一(中文论文成果由于存在语言壁垒,难以直接参与国际比较和评价)。在此导向下,国内高校普遍将国际期刊发表作为“双一流”建设期间科研人员工作业绩的主要评价指标之一(许心和蒋凯,2018;荆林波和逯万辉,2022)。为在建设周期内达成学科水平提升目标,各类高校强化了国际期刊发表的激励和考核,并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打造高水平人才队伍(余广源和范子英,2017;刘庆丰等,2025),快速提升了经济学者的国际发表能力。由此,本文提出假说1:

假说1 “双一流”建设要求经济学的学科水平国际可比,强化了国际期刊发表导向,促使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国际发表数量和影响力提升。

在相比过去更高标准的国际期刊发表激励和考核制度下,“理性”经济学者倾向于根据自身比较优势开展论文研究。相比域外经济问题,中国学者对本土问题在数据获取、调研实施、政策理解以及社会网络等方面具备天然优势。因此,“双一流”建设实施后,提升国际发表的目标一定程度上引导部分学者从侧重兴趣(比如对域外经济问题存在兴趣,然而产出高质量国际发表较为困难)转向论文发表导向,策略性增加本土议题研究的比重。^②

此外,“双一流”建设相比“211工程”和“985工程”建设,明确了对高校社会服务功能的要求(后两者的建设重点关注高校学科水平和研究团队等方面,未专门强调提升高校的社会服务能力),其建设成效评价遵循“需求导向,聚焦服务贡献”的原则,要求相关研究“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解决重大社会现实问题”。^③“双一流”建设的这一内在要求,进一步鼓励经济学者从事本土议题研究,以统筹“发表高水平国际论文”和“提升社会服务效能”(对于解决重大社会现实问题而言,域外经济研究做出实质性贡献的空间相对较小)。由此,本文提出假说2:

^① 关于“双一流”建设的政策演进、层级体系与代表性省级实施案例,以及“双一流”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目标的补充说明请见附录II。

^② 尽管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会提高中国议题论文得到期刊偏好并最终发表的概率(即需求端的推动),但需求端是逐步变化的,在“双一流”建设启动前后不存在明显的跳跃。因此,中国经济学国际发表的议题本土化主要来自供给端的变化。

^③ 参见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2/moe_843/202103/t20210323_521951.html,访问时间:2025年3月13日。

假说 2 “双一流”建设实施后,中国经济学者在提升国际发表的过程中,基于比较优势策略性地增加本土议题研究的比重。同时,“双一流”建设对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内在要求进一步强化了中国经济学国际发表的议题本土化。

图 1 对上述假说提供了特征事实层面的初步支撑。“双一流”建设启动后,经济学国际期刊上中国机构发表论文占全球比重快速上升(图 1 实线),为假说 1 提供了初步支撑。同时,2015 年后,域外研究占中国经济学国际发表的比重快速下降,且在 2018 年后尤为明显(图 1 虚线)。^① 这为假说 2 提供了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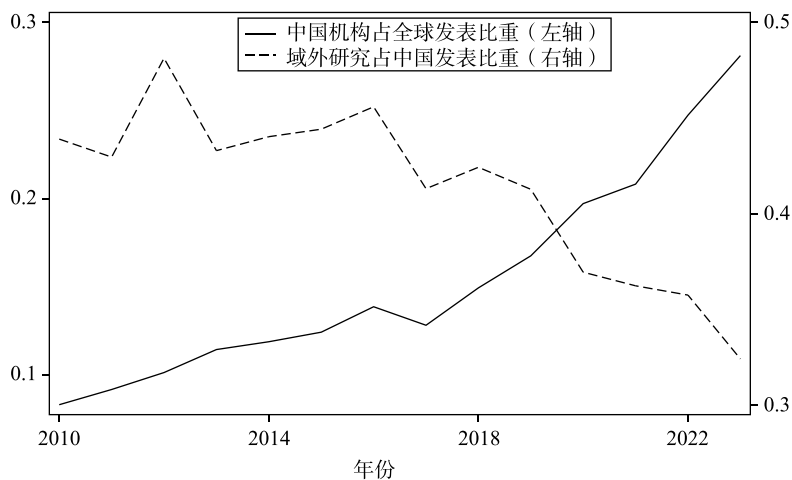


图 1 2010—2023 年中国经济学领域论文发表的国际化特征

注：由于本文经济学论文数据来源于爱思唯尔数据库，非爱思唯尔出版的经济学期刊未包含在内。

三、数据说明与实证策略

（一）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本文被解释变量数据来源于 WOS 引文数据库和爱思唯尔全文数据库。从 WOS 引文数据库提取了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经济学领域由爱思唯尔出版的 SSCI 期刊论文元数据。筛选条件包括:出版商为爱思唯尔;出版物类型为文章(Article)、评论(Review)和快报(Letter);语言为英语;WOS 的学科分类为“Economics”。提取信息包括作者、题目、摘要、关键词、语言、地址、高校、基金、被引次数、出版物类型、出版商、期刊名称、出版年份以及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等。基于 DOI 信息,通过爱思唯尔 ScienceDirect APIs 爬取了 108 045 篇论文的全文文本信息。

本文以 2010—2023 年间年均发文量前 50 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学国际发表特征为研究对象。被解释变量为论文发表数量、研究影响力(基于被引用频次计算;数值越高,则

^① 这可能与中美贸易摩擦等外部因素相关(Flynn et al., 2024; Jia et al., 2024),后者提高了国际合作的制度成本与产出不确定性,从而抑制了以域外经济体为对象的研究产出。

影响力越大)、高层次期刊占比、国际合作占比、本土研究占比和域外研究占比。^① 已有研究表明,人口规模、经济发展、对外开放、高等教育发展、信息化等因素会影响一国科研出版(Bentley, 2015; Cao et al., 2024)。据此,国家-年份层面共选取人口总数的自然对数、人均 GDP 的自然对数、产业结构、国际贸易额与 GDP 之比、政府教育支出与 GDP 之比、高等教育毛入学率、QS^② 前 200 高校数量的自然对数、研发人员数量的自然对数、使用互联网人数占比等 9 个控制变量。控制变量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公开数据库和 QS 世界大学排名。具体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见附表 A1。

(二) 实证策略

如前文所述,“双一流”建设对中国经济学科和经济学者的影响不仅限于入选世界一流高校和世界一流学科名单的高校,其对入选高校和非入选高校分别产生“资源配置效应”和“竞争驱动效应”,均可能积极影响其国际论文发表。因此,若简单以高校或学科是否入选“双一流”名单设置处理组和控制组进行估计,可能低估政策效应,即忽略了未入选高校和学科的“竞争驱动效应”。因此,本文以经济学国际论文发表量位居全球前 50 的国家或地区为样本,从国家层面构建双重差分模型,以中国整体作为处理组,将其他国家或地区作为控制组,评估“双一流”建设对中国在经济学领域国际化发表的影响。实证模型如式(1)所示:

$$Y_{jt} = \alpha_0 + \rho_1 China_j \times Post2015_t + X_{jt} + \delta_j + \sigma_t + \epsilon_{jt}, \quad (1)$$

其中, Y_{jt} 为国家 j 在 t 年的经济学国际论文发表情况,分别为发表数量(取自然对数值)、研究影响力、高层次期刊占比、国际合作占比、本土研究占比,以及域外研究占比。 $China_j$ 为国家虚拟变量,国家 j 为中国取 1,否则为 0。考虑到“双一流”建设于 2015 年 10 月正式实施,时间虚拟变量 $Post2015_t$ 设定为 2015 年“双一流”建设开启之后(即 2016—2023 年)记为 1,否则为 0。 X_{jt} 为前文所述 9 个国家-年份层面控制变量。模型还引入国家和年份固定效应,分别以 δ_j 和 σ_t 表示,用于控制国家间的系统性差异,如文化、语言环境等,以及时间层面不随个体变化的因素,如国际科研形势变化等。 α_0 和 ϵ_{jt} 分别为常数项和残差项。 ρ_1 是本文核心系数,反映“双一流”建设对中国经济学研究国际化发表的影响。标准误聚类在国家层面。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双一流”政策是中国“内生形成”而非随机实施的,且其启动可能受到外部形势变化的影响(比如中美科技博弈(Conroy, 2024)),基于国家(地区)层面评估“双一流”政策对科学研究国际化的影响可能存在偏误。尽管我们认为外部形势变化等潜在遗漏变量对本文核心结论的影响应处于有限范围内(详细讨论请见附录 IV),然而,必须承认的是,由于数据可得和方法本身的限制,本研究可能存在未被完全控制的组间差异,这是跨国比较研究中的固有缺陷。

① 具体变量构造见附录 III。

② QS 指英国高等教育咨询公司 Quacquarelli Symonds, 本文所用“QS 前 200 高校数量”数据来自其发布的《QS 世界大学排名》。

四、实证结果

(一) 基准回归结果

图 2 展示了中国与 G7 国家 2010—2023 年间经济学国际发表特征。^① 自 2016 年起,中国经济学国际发表数量和研究影响力明显上升(图 2(a)和图 2(b))。但高层次期刊与国际合作占比有所下降(图 2(c)和图 2(d))。聚焦到研究对象,样本期内,中国的本土研究占比高于 G7 国家均值约 33 个百分点,且自 2016 年后快速上升(图 2(e));而域外研究占比则低于 G7 国家均值约 30 个百分点,且 2016 年后快速下降(图 2(f))。以上特征事实为前述假说提供了支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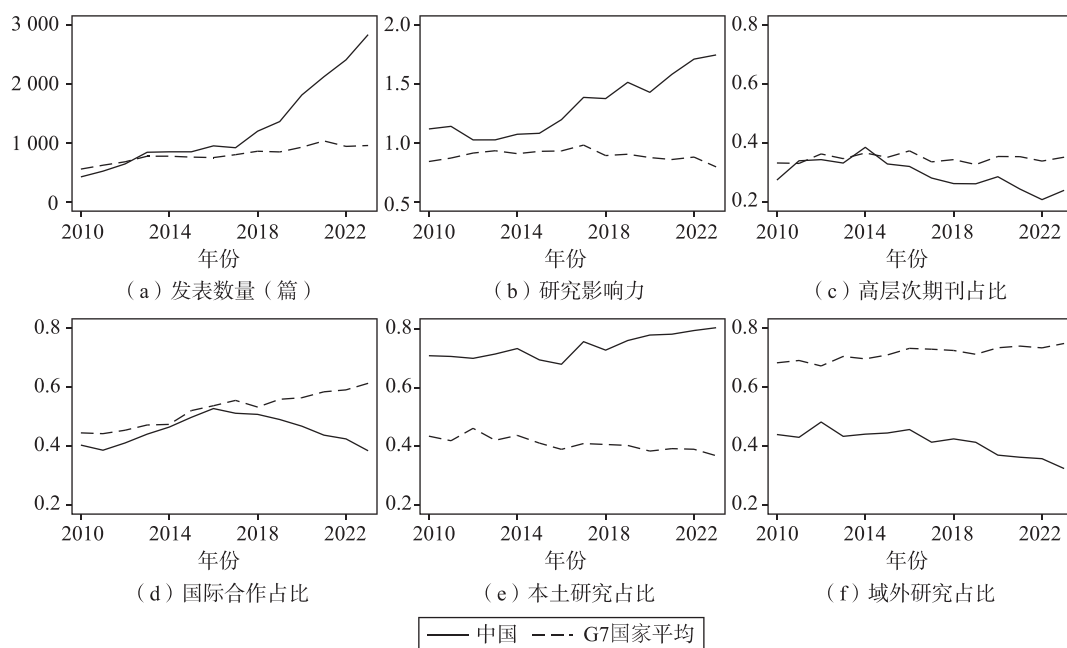


图 2 2010—2023 年中国经济学国际发表趋势

表 1 Panel A 和 Panel B 分别汇报了式(1)未加入和加入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第(1)—(6)列的被解释变量分别为发表数量(取自然对数)、研究影响力、高层次期刊占比、国际合作占比、本土研究占比和域外研究占比。无论是否加入国家层面控制变量,发表数量、研究影响力、本土研究占比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第(1)、(2)、(5)列),高层次期刊占比、域外研究占比显著为负(第(3)、(6)列)。加入控制变量后,国际合作占比系数为负但不显著。在控制相关因素后,“双一流”建设促使中国经济学国际发表数量相较于其他国家增长了约 46%($=\exp(0.377) - 1$),研究影响力提升了约 0.51(2015 年中国样本均值为 1.1),高层次期刊占比下降了 5.0 个百分点(2015 年的中国样本均值为 32.94%),本土研究占比增长了约 10.5 个百分点(2015 年的中国样本均值为 69.52%),域外研究占

^① 考虑中国论文发表规模较大,此处仅呈现其与 G7 国家的对比,但在计量回归中会扩大对照组样本。

比下降了约 10.5 个百分点(2015 年的中国样本均值为 44.41%)。^① 与前述假说一致,“双一流”建设在推动中国经济学国际发表数量和影响力提升的同时,也加深了研究议题本土化。除此之外,高层次期刊占比显著下降也部分印证了假说 2 中国际发表强化下中国学者的策略性应对,说明“双一流”建设实施后,提升国际发表的目标一定程度上引导部分学者从质量导向转向数量导向,策略性增加非高层次期刊的发表比例。

表 1 基准回归结果

	ln(发表数量)	研究影响力	高层次期刊占比	国际合作占比	本土研究占比	域外研究占比
	(1)	(2)	(3)	(4)	(5)	(6)
Panel A: 未加入控制变量						
<i>China</i> × <i>Post</i> 2015	0.318*** (0.062)	0.311*** (0.047)	-0.024** (0.011)	-0.057*** (0.011)	0.103*** (0.013)	-0.101*** (0.011)
国家和年份 FE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 ²	0.507	0.051	0.146	0.285	0.106	0.091
样本量	700	700	700	700	700	700
Panel B: 加入控制变量						
<i>China</i> × <i>Post</i> 2015	0.377* (0.191)	0.508*** (0.095)	-0.050** (0.024)	-0.001 (0.024)	0.105*** (0.036)	-0.105*** (0.030)
国家和年份 FE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 ²	0.591	0.070	0.224	0.377	0.181	0.154
样本量	613	613	613	613	613	613

注: *、**和*** 分别代表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截距项和控制变量系数由于篇幅原因进行了省略。下同。

(二) 事件研究法估计

上文发现,“双一流”建设显著推动了中国经济学国际发表的数量和影响力提升,也加深了研究议题本土化。但这一差异是否在“双一流”建设启动前就已经存在,即中国在“双一流”建设启动前就出现了论文发表国际化与本土化的趋势。同时,仅估计平均效应不能获得“双一流”建设对中国经济学国际发表的动态影响。本文基于事件研究法,判断处理组(中国)与控制组(其他国家)是否满足事前平行趋势,并考察“双一流”建设的动态影响(具体策略见附录 VI)。图 3 的估计结果表明,各期的回归系数在“双一流”建设启动前总体不显著,说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论文发表情况在政策实施前不存在显著的趋势差异。各项国际化指标的系数在“双一流”政策实施一定时间后显著异于零且系数方向与表 1 一致,说明中国的经济学领域国际发表相对其他国家产生显著变化。

尽管表 1 中加入控制变量后国际合作占比的估计系数不显著,但图 3(c)和图 3(d)结

^① 附录 V 还区分本土研究和域外研究论文样本进行回归检验,发现域外研究占比的下降具体表现为本土研究论文数量的显著上升和域外研究论文数量的未显著变化,即域外研究的规模并未在绝对量上收缩。

果显示,高层次期刊占比和国际合作占比在政策实施后均显著下降。该结果表明,“双一流”建设可能使高校通过国内学者的互相合作,发表数量较多的声誉一般的期刊来达到科研绩效。一部分原因是,“双一流”的国际化人才建设提升了国内团队的研究能力,降低了在非高层次期刊发表上对国际合作的依赖(Liang et al., 2022)。基于此,本文从国际合作的期刊异质性展开验证,附表 A4 报告了四类期刊国际合作研究占比的分样本估计。结果显示,不同层次期刊的国际合作研究占比在“双一流”建设启动后显著分化,中国高校发表在高层次期刊(一类和二类)的论文,其国际合作研究占比相对平稳,而三类及其他期刊的国际合作研究占比显著下降。后文分析(见表 2)则进一步反映,国际合作下降的现象主要源自非顶尖高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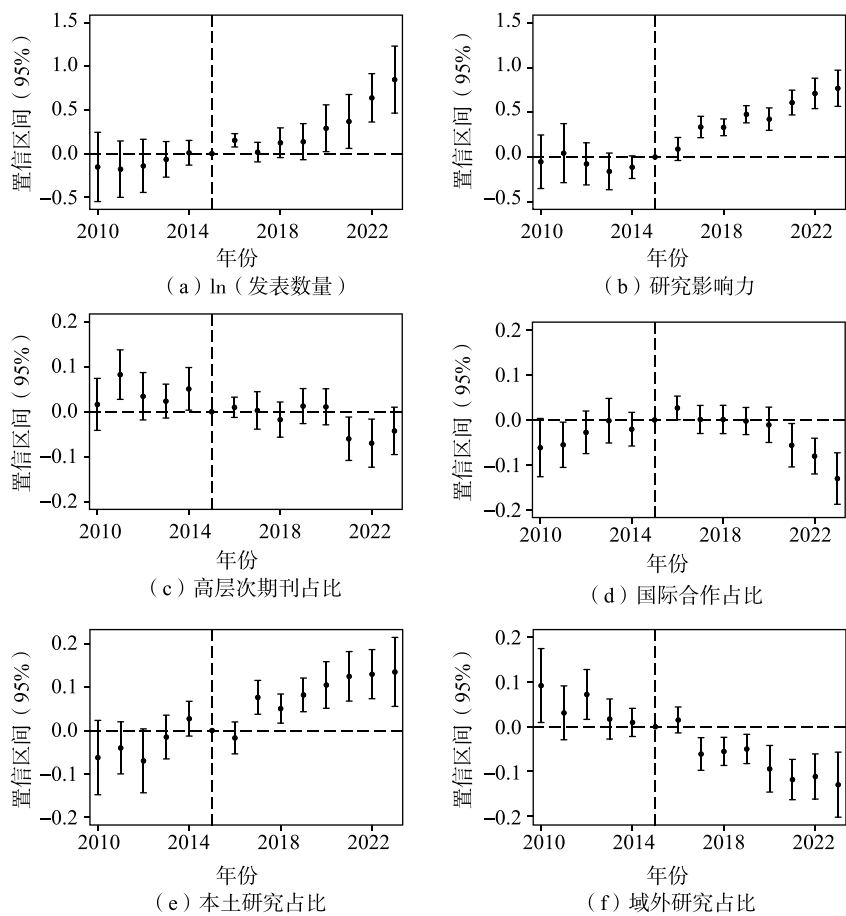


图 3 事件研究法估计结果

（三）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验证基准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进行了如下检验:“学术卓越计划”(包括“双一流”建设)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各国政府资助的旨在提升研究型大学国际排名的重大举措(Yudkevich et al., 2023),考虑到全球科研竞争加剧可能对识别结果产生干扰,手工检索并剔除了实施“学术卓越计划”的国家(多数为非英语国家)进行稳健性检验;考虑

到中美科技博弈这一外部形势变化可能对中国学术国际合作和域外知识生产造成负面影响(Conroy, 2024),剔除中美合作文章后重新构造国家-年份数据集进行稳健性检验;考虑到控制组内各国的异质性过大,分别筛选G7国家(加入中国)^①、中高及以上收入国家进行子样本回归;合成控制法通过构造反事实控制单元进行反事实分析,特别适用于只有一个或少数几个地区受到政策处理的情形(Abadie, 2021),考虑处理组样本只有中国,采用该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考虑到国家特征识别的判断条件可能对估计结果产生影响,更换国家特征次数判断条件^②进行敏感性检验。具体结果见附录Ⅶ。以上检验均表明基准估计结果稳健。

五、进一步分析

(一) 资源配置效应还是竞争驱动效应?

如前文所述,入选“双一流”建设高校与非入选高校可能会受“资源配置”和“竞争驱动”两类效应的影响,进而提升学科国际化水平。然而,基准回归以全国为处理组,无法对两种效应进行区分。为进一步剖析“双一流”建设对中国经济学国际论文发表的影响,基于中国高校层面数据(以内地高校为处理组、港澳台高校为对照组)进行回归检验(具体估计模型见附录Ⅵ)。估计结果见表2。Panel A显示,在内地高校全样本的回归中,相比港澳台高校,内地高校在2015年后的经济学国际论文发表数量和研究影响力显著上升,高层次期刊占比和国际合作占比下降,同时域外研究占比显著下降。结果与表1基准回归所示以中国外其他国家为控制组的估计在系数的正负方向和显著性上基本一致,系数的绝对值相对更大。分样本回归显示(Panel B至Panel E),在发表数量和研究影响力上,内地各层次高校均在2015年后相比港澳台高校显著增长(第(1)、(2)列);然而,在高层次期刊占比上,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和经济学一流学科建设高校未发现显著变化,而另外两类高校则显著下降(第(3)、(4)列)。在研究议题的结果上同样存在显著差异,后两类高校的论文发表是2015年后研究议题本土化的主要原因(第(5)、(6)列)。

表2 高校层面“双一流”建设效应分析

	ln(发表数量)	研究影响力	高层次期刊占比	国际合作占比	本土研究占比	域外研究占比
	(1)	(2)	(3)	(4)	(5)	(6)
Panel A: 内地 vs. 港澳台						
$Treat \times Post_{2015}$	1.020*** (0.086)	0.678*** (0.091)	-0.193*** (0.034)	-0.058** (0.029)	0.258*** (0.034)	-0.208*** (0.033)
样本量	3 164	3 164	3 164	3 164	3 164	3 164

① “G7国家(加入中国)”用于描述子样本回归的样本范围;在构造差分中的控制组时,中国被视为处理组,因此控制组仅包括G7国家,不包括中国。

② 基准回归以论文中某一国家名称在全文中出现次数是否大于等于5次作为识别其研究对象国的标准。本部分将该阈值依次调整为大于等于10次、15次和20次,并据此重新估计。

(续表)

	ln(发表数量)	研究影响力	高层次期刊占比	国际合作占比	本土研究占比	域外研究占比
	(1)	(2)	(3)	(4)	(5)	(6)
Panel B: 一流大学建设 vs. 港澳台						
<i>Treat</i> × <i>Post</i> 2015	1.062*** (0.093)	0.503*** (0.131)	−0.044 (0.046)	0.010 (0.036)	0.092* (0.053)	−0.074 (0.047)
样本量	1 190	1 190	1 190	1 190	1 190	1 190
Panel C: 经济学一流学科建设 vs. 港澳台						
<i>Treat</i> × <i>Post</i> 2015	1.040*** (0.172)	0.272** (0.117)	−0.016 (0.063)	0.052 (0.070)	0.047 (0.074)	−0.026 (0.062)
样本量	784	784	784	784	784	784
Panel D: 其他一流学科建设 vs. 港澳台						
<i>Treat</i> × <i>Post</i> 2015	1.084*** (0.101)	0.736*** (0.119)	−0.237*** (0.045)	−0.074** (0.034)	0.286*** (0.040)	−0.231*** (0.038)
样本量	1 428	1 428	1 428	1 428	1 428	1 428
Panel E: 非“双一流” vs. 港澳台						
<i>Treat</i> × <i>Post</i> 2015	0.954*** (0.106)	0.761*** (0.106)	−0.251*** (0.038)	−0.089*** (0.034)	0.337*** (0.041)	−0.273*** (0.039)
样本量	1 778	1 778	1 778	1 778	1 778	1 778

因此,高校层面估计反映,“双一流”建设通过“资源配置效应”和“竞争驱动效应”,对各类高校的论文发表成效都产生了积极影响,体现为发表数量和研究影响力的上升。然而,对于“竞争驱动效应”占主导的其他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和非“双一流”高校,在发表数量和研究影响力上升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伴随着高层次期刊占比下降,以及议题向本土问题倾斜的特征。上述现象,可能是由于前两类高校本身的国际化水平较高,且在全球学术网络中的地位相对稳定。相比之下,其他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和非“双一流”高校由于学科基础相对薄弱,且资源相对匮乏(未直接受到“双一流”建设的政策支持),倾向于在更容易取得成果的本土议题上进行聚焦,遵循数量优先原则,以最大化论文发表成效,以期在下一轮“双一流”中胜出。^①此外,国际合作研究占比下降与附表 A4 的结果形成呼应。其他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和非“双一流”高校在提升非高层次国际期刊发表的过程中,降低了国际合作研究的比重。

(二) 域外研究不足:区分期刊层次和研究对象国别

“双一流”建设实施后,中国经济学研究在不同层次期刊上的表现呈现出明显的分化

① 附表 A5 还以非“双一流”高校作为控制组,对比“双一流”高校和非“双一流”高校间的趋势差异(样本为第四轮学科评估中理论经济学或者应用经济学学科评估结果至少有一个为 B+及以上的高校)。结果表明,论文数量和研究影响力的上升,以及研究议题本土化的特征,均在非“双一流”高校更为显著,说明竞争驱动效应发挥了重要作用。

特征。本文进一步分析 2010—2023 年中国与其他国家经济学研究在不同层次期刊上的议题本土化趋势。将论文发表的期刊分为四类(一类、二类、三类、其他;期刊层次依次下降),表 3 报告了四类期刊域外研究占比的分样本回归结果。^① 一类和二类期刊(第(1)、(2)列)的交互项估计系数均不显著,而三类及其他期刊(第(3)、(4)列)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相关的事件研究法估计结果见附图 A1,与表 3 结果总体一致)。因此,不同期刊层次的域外研究占比在“双一流”建设后显著分化,中国高校发表在高层次期刊(一类和二类)的论文,其域外研究占比相对平稳,而三类及其他期刊的域外研究占比显著下降。这与表 2 的结果形成呼应,其反映非顶尖院校的论文发表呈现了更强的议题本土化特征,而在这一类高校的论文发表结构中,三类及其他期刊相对占据主导。

表 3 域外研究的期刊异质性

	一类 (1)	二类 (2)	三类 (3)	其他 (4)
<i>China × Post 2015</i>	-0.007 (0.071)	-0.023 (0.072)	-0.149*** (0.036)	-0.121*** (0.02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国家和年份 FE	是	是	是	是
R ²	0.059	0.067	0.107	0.091
样本量	613	613	613	613

除期刊层次外,中国经济学研究在研究对象的国别结构上在“双一流”建设启动后也呈现出明显的分化特征。表 4 报告了“双一流”政策对中国经济学国际发表中研究美国、G7 国家(含美国)、非 G7 国家、中国邻国以及非邻国占比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到,研究非 G7 国家占比(第(3)列)和研究非中国邻国占比(第(5)列)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研究美国、G7 国家和中国邻国占比(第(1)、(2)、(4)列)的估计系数不显著(附图 A2 展示了动态效应分析结果,与表 4 结果总体一致)。这说明,“双一流”政策在强化本土研究的同时,在域外研究的国际化覆盖上产生了区域性差异,对地缘政治和经济联系更紧密的 G7 国家和中国邻国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关注,而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关注显著减少。

表 4 域外研究结构发展趋势检验

	美国 (1)	G7 (2)	非 G7 (3)	邻国 (4)	非邻国 (5)
<i>China × Post 2015</i>	-0.016 (0.019)	-0.034 (0.024)	-0.066*** (0.023)	-0.019 (0.014)	-0.111*** (0.02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① 经济学期刊层次信息参考《上海财经大学常任轨教职学术刊物目录》,期刊名单见附表 A2。该目录将经济学国际期刊划分为五个等级,分别为顶级、一类、二类、三类和其他。该目录的制定标准以北美前 50 名经济学系为参照,依据常任教职评定的要求对期刊进行分类,在学术界具有较高的代表性。本研究所依据的期刊目录版本发布于 2014 年,2018 年和 2024 年对部分期刊分档作了少量调整,本研究相关归类以 2014 年版本为准。

(续表)

	美国	G7	非 G7	邻国	非 邻国
	(1)	(2)	(3)	(4)	(5)
国家和年份 FE	是	是	是	是	是
R ²	0.068	0.072	0.152	0.053	0.140
样本量	599	613	613	613	613

注：各国的邻国识别基于手工收集，包括陆上邻国与海上邻国。陆上邻国与海上邻国界定参考各国官方发布的陆地边界条约和海洋边界条约，并结合各国官方发布的地图进行人工识别。对于与我国存在领土争议的国家，本文以自然资源部监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为准。

六、政策含义

本文研究表明，“双一流”建设实施以来，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国际化水平快速提升，但有日趋聚焦于本土问题、对全球性问题关注不足的现象。随着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全球视角下的知识体系需求日益迫切，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亟需充分纳入大国特征的考量(陆铭,2022)。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增加经济学领域的区域国别研究力量。在当前经济学的学科设置下，理论经济学下设的世界经济学二级学科承担了区域国别经济研究的人才培养任务。然而，在当前的该学科建设中，更多关注国际金融、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等与中国本土经济高度相关的研究对象，域外经济受到的关注较少。因此，建议根据高校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以及所在地的地理区位和对外经济交流现状，通过成立特定区域国别经济研究中心的形式，培育研究力量。第二，充分利用来华留学生的研究力量。当前来华留学生人才培养已初见成效，不少毕业生学成归国后，在当地政府与社会已具有一定影响力。对于来华留学生培养规模较大的高校，可充分发掘来自特定区域和国家留学生的潜能，通过这一渠道增加开展目标国家(地区)微观经济研究、赴外经济社会调研的机会，增加研究深度。来华留学生毕业后若回国就业，可为母校推进针对特定区域和国家的经济学研究提供助力，夯实区域国别视角下经济学深耕式研究的基础。第三，在研究支持和激励上加强对域外经济问题的关注。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申报中，适当加入一定比例的域外经济问题选题导向，调整当前在经济学研究领域，研究域外经济问题较难获得匿名评审专家认可、获得基金资助的偏向。

此外，本文揭示的中国经济学研究国际化发展过程中呈现的“论文发表国际化”和“研究议题本土化”二元特征，尽管总体上是积极的，反映了中国经济学日益提升的国际影响，但也应注意到，基于本土议题的一系列国际论文发表，并不等同于中国经济学已走出一条独立自主的学科发展道路。实事求是而言，当前中国相当一部分经济学研究在理论和方法层面仍基于西方成熟的研究范式(孙圣民,2023)。要实现以独立自主为前提的学科国际化发展，应基于中国国情和发展逻辑提炼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创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知识体系(张东刚,2024)。在此基础上，以中国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对全球性经济问题提出中国机构和学者的理论解释和解决方案，从而实现从“本土研究”向

“全球贡献”的跃升。这一发展路径有助于提升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整体创新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也将为全球经济学科的发展、全球重大经济问题的解决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 [1] Abadie, A., “Using Synthetic Controls: Feasibility, Data Requirements, and Methodological Aspect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21, 59(2), 391-425.
- [2] Angrist, J., P. Azoulay, G. Ellison, R. Hill, and S. Lu, “Economic Research Evolves: Fields and Styl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7, 107(5), 293-297.
- [3] 鲍威、哈巍、闵维方等,“‘985工程’对中国高校国际学术影响力的驱动效应评估”,《教育研究》,2017年第9期,第61—69页。
- [4] Bentley, P. J., “Cross-Country Differences in Publishing Productivity of Academics in Research Universities”, *Scientometrics*, 2015, 102(1), 865-883.
- [5] Cao, Y., R. C. Sickles, T. P. Triebs, and J. Tumlinson, “Linguistic Distance to English Impedes Research Performance”, *Research Policy*, 2024, 53(4), 104971.
- [6] Conroy, G., “China-US Research Collaborations Are in Decline-This Is Bad News for Everyone”, *Nature*, (2024-07-19)[2025-03-14],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4-02046-9>.
- [7] 陈丽媛、刘念才,“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中国模式及其国际影响”,《教育研究》,2019年第6期,第105—115页。
- [8] Flynn, R., B. Glennon, R. Murciano-Goroff, and J. Xiao, “Building a Wall around Science: The Effect of US-China Tensions on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Research”, *NBER Working Paper*, 2024, No. 32622.
- [9] 郭从斌,“中国高水平大学学科发展现状与建设路径分析——从ESI、QS和US News排名的视角”,《教育研究》,2016年第12期,第62—73页。
- [10] 贺德方,“中国高影响力论文产出状况的国际比较研究”,《中国软科学》,2011年第9期,第94—99页。
- [11] 何佳讯、葛佳桦、张凡,“中国学者管理学研究的世界贡献:国际合作、前沿热点与贡献路径——基于世界千种管理学英文期刊论文(2013~2019年)的定量分析”,《管理世界》,2021年第9期,第36—67页。
- [12] Hu, A., “Public Funding and the Ascent of Chinese Science: Evidence from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Research Policy*, 2020, 49(5), 103983.
- [13] Jia, R., M. E. Roberts, Y. Wang, and E. Yang, “The Impact of US-China Tensions on US Science: Evidence from the NIH Investigation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24, 121(19), e2301436121.
- [14] 荆林波、逯万辉,“新时代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发展与评价”,《管理世界》,2022年第5期,第131—141页。
- [15] Kang, Y., and R. Liu, “Does the Merger of Universities Promote Their Scientific Research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a”, *Research Policy*, 2021, 50(1), 104098.
- [16] 李澄锋、陈洪捷、沈文钦,“中外联合培养经历对博士生科研能力增值及论文产出的影响——基于‘全国博士毕业生离校调查’数据的分析”,《高等教育研究》,2020年第1期,第58—67页。
- [17] Liang, W., J. Gu, and C. Nyland, “China’s New Research Evaluation Policy: Evidence from Economics Faculty of Elite Chinese Universities”, *Research Policy*, 2022, 51(1), 104407.
- [18] 林金辉,“中外合作办学中引进优质教育资源问题研究”,《教育研究》,2012年第10期,第34—38+68页。
- [19] 林毅夫,“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庆祝《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经济研究》,1995年第10期,第13—17页。
- [20] 林雨昕、刘怡,“基础研究资助逆向激励的考察”,《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3年第11期,第94—116页。
- [21] 刘庆丰、郑世林、丛正龙,“国际合作交流对中国高校教师科研产出的影响——来自经济学科海外访学的证据”,《经济学》(季刊),2025年第1期,第137—154页。

- [22] 陆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之中国需要转型发展的大国经济学”,《管理世界》,2022年第6期,第47—49页。
- [23] 马浚锋,“择优支持政策能否改善大学科研创新效率——来自‘双一流’建设的准自然实验”,《科学学研究》,2025年第10期,第2155—2165+2198页。
- [24] 马浚锋、罗志敏,“从‘锦上添花’到‘雪中送炭’:‘双一流’建设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教育与经济》,2024年第5期,第78—87+96页。
- [25] 孙圣民,“经济学理论、实践与本土化——兼谈中国自主的经济学体系构建”,《经济研究》,2023年第12期,第185—202页。
- [26] 万明、梁壮,“‘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动态调整机制研究”,《研究生教育研究》,2021年第6期,第85—89页。
- [27] Wang, Y., P. Li, H. Gao, and M. Li, “Do the Elite University Projects Promote Scientific Research Competitiveness: Evidence from NSFC Grants”, *Research Policy*, 2024, 53(10), 105074.
- [28] 吴宇川、丁延庆,“‘双一流’建设对本科专业生源质量的影响——基于山东省高考录取数据的实证研究”,《中国高教研究》,2022年第6期,第57—63页。
- [29] 许宏伟、钟粤俊,“教育资源再配置与创新研发——基于高校合并的视角”,《经济学》(季刊),2022年第3期,第1039—1060页。
- [30] 许心、蒋凯,“高校教师视角下的人文社会科学国际发表及其激励制度”,《高等教育研究》,2018年第1期,第43—55页。
- [31] 余广源、范子英,“‘海归’教师与中国经济学科的‘双一流’建设”,《财经研究》,2017年第6期,第52—65页。
- [32] 原珂、廖逸儿,“重点高校专项支出对‘双一流’大学建设促进了多少?——基于156所重点高校的绩效检验”,《中国软科学》,2022年第3期,第1—10+35页。
- [33] Yudkevich, M., P. G. Altbach, and J. Salmi, *Academic Star Wars: Excellence Initiatives in Glob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2023.
- [34] 张东刚,“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若干思考”,《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5期,第90—104+206页。
- [35] 张文杰、哈巍,“合并、扩招、新建校区与高等学校办学成本——基于中国高等教育变革的准实验”,《教育研究》,2022年第4期,第92—106页。
- [36] 郑世林、张沛康,“基础研究资助促进了高校毕业生就业——基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经验证据”,《经济学》(季刊),2024年第4期,第1121—1138页。
- [37] 钟卫、姜万军,“我国高校扩招后办学效率和生产率的变化”,《统计研究》,2017年第1期,第91—101页。
- [38] Zong, X., and W. Zhang, “Establishing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in China: Deploying a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 to Evaluate the Net Effects of Project 985”,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2019, 44(3), 417-431.

The “Double First-Class” Initiative Promotes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a’s Economic Research: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Perspective

XU Hangtian SU Zhi*

(Hunan University)

HOU Junjun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Hunan University)

LIN Weiyang

(Hunan University)

Abstract: Using Elsevier’s full-text database, we explore the impact of the “Double First-Class” initiative on China’s economic research. We find that both universities selected and not selected for the “Double First-Class” were positively affected, the latter of which may be due to the competition effect. The number and influence of papers published by Chinese universities have increased, but the research topics are increasingly focused on domestic issues, and the Chinese voice in international issues is insufficient. This phenomenon is particularly evident in non-top universities and non-high-level journals, as well as in studies on countries outside the G7 and China’s neighbors.

Keywords: “Double First-Class” initiative; economic research;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JEL Classification: I23, I28, O38

* Corresponding Author: SU Zh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Trade, Hunan University, No.109 Shijiachong Road, Yuelu District, Changsha, Hunan 410006, China; Tel: 86-18656304029; E-mail: zhisu@hnu.edu.cn.